教科书研究的内涵、价值与方法

王攀峰 陈 洋

摘 要: 文章探讨了教科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路径。文章认为教科书研究既是一种科学研究,也是一种文本分析和教学分析;教科书研究可以促进课程与教学的理论创新,可以为教科书编审和评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还可以推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的整体改革;教科书研究应采取"集大成"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构建"理论 - 现实 - 历史"的三维研究框架,运用多元互补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教科书研究;科学研究;文本分析;教学分析;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9142(2018)01 - 0167 - 08

教科书研究自世界二战以后获得极大发展,它使用了广泛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并日渐形成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至今它仍然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Johnsen 指出,"教科书研究影响范围广泛,却从来没有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大学学科。尽管已有国际认可的阐述教科书开发和生产技术过程的文本,但是教科书研究至今仍没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而"方法论的探讨则有助于推动教科书研究成为大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①]教科书研究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发挥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就要有专门的研究工具和技巧,还要创建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本文通过深入探讨教科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路径,旨在推进教科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升教科书研究的内在品质。

收稿日期:2017 - 05 - 10
作者简介:王攀峰,女,湖北荆州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陈洋,女,河北邢台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重点课题"教科书研究方法的理论建构与实际应用"(BADA16016)的阶段性成果。

① Johnsen, E. B., *Textbooks in the Kaleidoscope: A critical survey of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on education text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1、23.

一、教科书研究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教科书研究？教科书研究泛指对教科书问题的科学研究。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教科书研究也是由研究现象、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共同组成的，发挥着理论指导、政策调控和文本解释的作用。但是，它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独有的内涵特点。所谓教科书研究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描述教科书中的现象，分析教科书中的问题，力图揭示教科书编制和使用的内在规律。教科书研究不仅关注教科书文本的编制和改进，而且关注教科书使用的实际效果，它贯穿于教科书制作和发展过程的始终，具体包括教科书文本内容的分析、教科书的需求调查、教科书的专业审查、新教科书的实验研究、教科书使用的调查等。高品质的教科书研究有助于保障和提升教科书制作活动的科学性与专业性。

为了理解教科书研究，我们还应把它与教科书解读、教材分析等相关概念进行比较。教科书研究、教科书解读与教材分析都是对教科书中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理解，但是三者截然不同。(1)从性质上看，教科书研究是研究者通过对教科书中感性材料的加工来探索本质规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是一种描述式、解释性的研究活动；教科书解读是对教科书进行的感性认识或思想阐释，是一种肯定式、认同式的宣传解说活动；教材分析是教师对课程标准、教科书以及教学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组织原理，是一种教学前的准备活动。(2)从主体上看，教科书研究是以研究人员为主体，教科书解读是以专业人员(教科书编写者、出版者、教研员、师生)为主体，教材分析是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3)从思想前提上看，教科书研究的前提是把教科书看做客观的研究对象和开放文本，具有改进和完善的空间；教科书解读的前提是把教科书视为当前国家课程政策的重要组成，占据着绝对的权威地位；教材分析的前提是把课程标准和教材视为教学设计的重要依据，是教师备课的前提和核心。(4)从对象上看，教科书研究是针对历史或当前任何类型的教科书，教科书解读主要针对即将发行或正在使用的教科书，教材分析主要针对与教师教学相关的课程标准、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等。(5)从目的上看，教科书研究旨在把握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为分析、评价和改进教科书提供理论支撑；教科书解读旨在更好地宣传、推广和应用现有的教科书；教材分析旨在让教师更好地理解教材、运用教材、开展教学。由此可见，教科书研究是一种理性话语或研究话语，教科书解读是一种政策话语，教材分析是一种实践话语。

二、教科书研究的主要特征

(一)教科书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

教科书研究是研究者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遵循一定的科学研究程序，通过分析和重构教科书文本探寻教科书的本质规律的科学研究。

科学的教科书研究有其先行的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并受到这些前提假设的制约。Staffan Selander认为，教科书研究要成为一种科学的活动，必须建立五个基本假定：第一，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的世界；第二，教科书是对客观世界的社会重建；第三，教科书在根本上是由制度(如，教育体制)决定的；第四，教科书适应制度化定义的需要，具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第五，可以通过解析重构教科书，探寻教科书文本与外部世界、教科书与其他文本(如，科学著作)之间的关系，以此分析一本或一套教科书所体现的典型思想(观点、解释模式等)。[①]前两条说明了教科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教科书是对外部

① Staffan Selander, Towards a Theory of Pedagogic Text Analysi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0, 34(2):143 - 150.

世界的解释和反映，如果我们不能把教科书文本视为一种对应外部世界的事实或解释，教科书就不会有任何客观参考价值，教科书研究也会丧失意义。第三、四条揭示了教科书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区别，作为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物，教科书具有特定的内在结构，否则，学生就不可能通过学习来把握教科书的基本思想，教师的教学活动也失去了依据和支持。第五条揭示了教科书研究的本质，教科书研究就是通过构建一种分析框架来探寻文本与世界的双重关系：一是检验教科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探讨教科书是否客观正确地呈现了客观世界？教科书对于客观世界是否给出了有效的理论解释？二是考察教科书与其他文本体裁（科学著作或文学小说）之间的关系，探讨学校应该教什么知识？当学科知识转换成教科书时，知识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以上前提假设提供了教科书研究对象的性质假设，是开展教科书研究的认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教科书研究就是要通过系统的实证分析和严谨的逻辑推理，发展一种能够解释教科书中各种现象的科学理论、抽象化模型或概念框架，从而增进人们对教科书问题的理解。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教科书研究也许难以发现具有普适性、规律性的“宏大理论”，但是，可以通过分析和探讨特定的教科书现象，发展出有助于解释教科书相关问题的“解释模型”或“中层理论”。这种“解释模型”或“中层理论”介于教科书的科学理论与经验描述之间，它是对部分的教科书现象和问题的抽象，而人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教科书问题可以大致地被这些理论或模型所解释。科学的教科书研究使我们对教科书的理解建立在可检验的模型和理论的基础之上，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解释教科书问题和开展专业的教科书研究，使我们观察教科书现象时具有专业的“理论视角”，并以专业批判与科学探索的方式推动教科书的发展和进步。

（二）教科书研究是一种文本分析

教科书研究是对教科书文本自身的研究，是一种静态的文本分析。与其他的文本分析不同，教科书研究以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作为基本参照，是一种课程文本分析。

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课程文本，教科书只有符合国家的教育目的、遵从学科的课程标准，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科教学活动。教科书与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密不可分，两者的关系体现为：一方面教科书应该以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为指导，应包括国家课程标准所强制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学科内容；另一方面教科书还应与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连接、重组和发展学科内容，实现学科内容的教学论转化和可操作化，真正地促进学科教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教科书研究是以国家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为主要指导，通过分析和阐释教科书文本，探讨教科书中可观察的现象和问题，提高教科书的质量，更好地完成学校课程的任务。教科书研究的开展必须以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作为重要依据，关注教科书与课程标准之间的一致性。

教科书具有文化性、教学性、政治性和商品性等诸多属性，不同的属性决定了教科书文本分析的不同内容。从文化性的视角出发，教科书是对文化知识的选择和重组，是学科内容的物质载体，教科书研究应探讨教科书文本所涉及的学科内容的广度、深度和难度，内容选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所选内容与课程标准的吻合程度等；从教学性的视角出发，教科书是为了提高教学有效性而有意结构化的工具，教科书研究应分析学科内容组织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确性，内容呈现的开放性、生成性和启发性，文本表达与学生学习心理规律的符合程度；从政治性的视角出发，教科书是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教科书研究应探讨教科书文本内容体现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意识，教科书在增进学生的国家认同和国际理解方面的作用，教科书在滋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人文情怀方面的效果；从商业性的视角出发，教科书应满足出版者、使用者、编制者等教科书市场主体的意愿和需求，教科书研究应分析教科书的编制与学校资源环境的适应程度、教科书的投入发行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概而言之，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是对教科书文本的内容、结构、价值和可接受性等问题的研究。

（三）教科书研究是一种教学分析

与单纯的学术研究不同，教科书研究还是一种与课堂实践密切相关的教学分析。对于教师、学生和家长而言，教科书就是课程在课堂教学中的实际呈现形式，在课程与教学实践领域占据中心地位。教科

书不仅是读者最广泛、内容最成熟、知识最基础的出版物，而且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主要依据；教科书不仅体现了课程标准，而且规定着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学校课程从政策话语转化为实践活动的重要中介，是影响学校课程实施的一个主要因素；教科书不仅决定着教师教什么，而且还决定着教师怎样教，是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的中心环节；教科书不仅是学科内容的集中体现，而且是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教学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教科书和学习资料在学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生与教科书互动的深度和质量是全世界公认的实现学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不使用教科书，那么这些高质量的学习资料是毫无用处的"，因此，应"确保教科书研发工作在优质教育框架中开展"。① 从这个角度出发，教科书研究不仅需要静态的文本分析，而且需要动态的教学分析。

教科书的教学分析就是在教科书实际使用中，探讨教科书与教师、学生、课堂环境、教学目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教学分析是一种动态的教科书研究，它充分考虑教科书使用者的实际情况，兼顾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双重需要，探讨教科书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效果、教科书易于教和便于学的特性、教科书与学生知识水平的适合性、教科书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的支持、教科书对教师选择教学策略的影响、教科书在提升教师教学效果方面的作用、教科书语言的可读性等问题。

Pingel 指出，不同的主体对于教科书问题的关注视角是不同的。"历史、地理、社会科学类的大学教授主要关注教科书文本内容分析，而教师更加关心如何将特定的学科知识传递给学生。"自 1980 年代后期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科书研究中运用了参与性更强的行动研究模式，包括学习者、家长及社区成员在内的教科书使用者，被邀请和鼓励同教科书作者、编辑和出版商一起发现问题、讨论选项和提出建设性意见。国际教科书研究项目的经验表明，"学术专家和教师能够且愿意合作是最重要的"，"学科导向的专家知识与教师的教育经验必须给予同等重要的地位"②。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活动，教科书研究需要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促进专家与教师的合作对话，实现文本分析与教学分析的统一。

三、教科书研究的重要价值

（一）学术价值：教科书研究可以促进课程与教学的理论创新

教科书建构了国家文化的基石，它不仅是一种静态的文化符号和课程文本，而且是一种动态的、旨在实现育人功能的文化实践形式，参与到知识传播、社会发展和思想变革的历史过程之中，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实践指向性。实际上，教科书不是一种普通的文本，它以"官方知识"和"合法知识"的身份参与到课程改革和教学实践之中，将宏观的教育战略转化成学生吸收的知识营养，发挥着巨大的育人功用。研究者们或是透过孩童手中的小课本来解读学校课堂中的知识启蒙和文化传播对国家发展的巨大力量，或是从课本内容、形式、价值的演变来探寻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科书研究在本质上是以课程知识的微观视角切入国家宏观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教科书研究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学研究，而是裹挟着历史反思、文化重构、思想梳理等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思想史等多个学科视角的探索，试图将学科知识的组织、选择、演变与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理解教科书在国家文化建设和现代文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新时期开放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教科书研究超越了传统的教育学领地，把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视域引入到课程与教学研究之中，消除了知识与实践、个人与国家、教育与政治之间的阻隔，推动了课程与教学研究的理论创新。

（二）技术价值：教科书研究可以为教科书编审和评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① UNESC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Textbook and Learning Materials*, Paris: UNESCO, 2005, p.7 - 13.

② 参见 Pingel, F., *UNESCO Guidebook on Textbook Research and Textbook Revision* (2nd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Paris: UNESCO, 2010, p.31; UNESC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Textbook and Learning Materials*, Paris: UNESCO, 2005, p.31.

伴随着教科书政策从“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的转变，一方面，独家出版社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教科书市场焕发出勃勃生机，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教科书设计理念和技术落后、教科书雷同、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教科书开发专业队伍及专业素养准备不足等问题。比如，在教科书编写上，编写者编写教科书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由此导致编写出来的教科书雷同僵化、缺乏创新；在教科书评审中，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价工具和统一的指标体系，较多地依赖评审者的主观判断和个体经验，导致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特色。这一事实表明，我国缺乏教科书研究的积累，也就难以在教科书开发的理念和技术上获得创新。要深入推进课程改革，有效提高教科书质量，就需要加强教科书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有效地应用到教科书实际工作中。教科书研究不仅可以革新人们的课程观念和教材理念，而且可以为教科书的编写、评价和选用提供科学的工具方法和技术支持。只有大胆地运用新方法和新工具，将科学可行的方法和客观的指标体系应用于教科书分析评价工作，才能推动教科书编写和评审工作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才能真正提升教科书的品质；只有不断地引入新理论和新概念，才能推动教科书设计理念的创新，才能探索出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操作性强的分析工具，才能使教科书评审和选编超越个体经验和主观判断，真正步入科学有序的轨道。

（三）社会价值：教科书研究可以推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的整体改革

教科书的改革问题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小学课程改革的问题。对于课改决策者而言，课程标准只有转化成教科书，才能进入中小学课堂；对于课改实施者而言，只有对教科书中的内容、要素和原理进行合理分析，才能在课堂中利用教科书落实课程改革的思想；对于课改评价者而言，教科书的质量评价是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组成，教科书本身也是开展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每一次课程改革的实施都会伴随着新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教科书知识的选择、传递、应用和评价的过程，就是课程改革从理想蓝图落实到课堂教学、从政策文件转化为师生经验的过程。

教科书研究是把握和推进学校课程改革的出发点，是学校课程改革取得成效的前提和保障。教科书研究通过探索教科书政策、教科书编写、教科书使用、教科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途径，增强教科书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提升各科教科书的编制质量，从而推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的整体变革。比如，近年来，有学者从晚清西学教科书引进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21世纪的课程改革，对我国百年教科书内容和形式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第一次对教科书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为我国新时期课程教材改革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思想基础；还有学者对我国现行教科书蕴含的性别偏见、道德观点、政治意识、价值取向进行内容分析，揭示教科书文本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改进我国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提升教科书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学者对我国教科书的管理制度、教科书的使用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揭示了主要问题和深层原因，直接推动了课程教材管理的规范化、课程教材实施的科学化。①

四、教科书研究的方法论路径

（一）采取“集大成”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教科书就是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不同学科基于自己的理论视角探讨教科书问题，提出了探索教科书本质的不同路径。这种多学科研究不仅为教科书研究引入了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方法，促进了教科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而且推动教科书研究从单一线性的思维方式转向多元复杂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多学科研究大多是零散、片面和不系统的，仅仅给教科书研究带来了“片面的深刻”。当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进入教科书领域时，它们关注的往往是与本学科相关的教科书问题，如社会学家关注的是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出版学家关注的是教科书中的技术市场因素和制度政策

① 王攀峰：《教科书研究方法的现状、问题与建议》，《课程·教材·教法》2017年第1期，第34-47页。

调控，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教科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演变，学科专家关注的是教科书中学科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教科书仅仅是一种政治工具、一种文化商品、一个历史侧面、一种学科知识体系等。因此，教科书和教科书研究成为一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成为其他学科理论的案例。教科书的多元属性及其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推动了教科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但是并没有给教科书研究构建统一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方法论。

现代教科书研究应采用“集大成”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现代教科书研究不是对多种学科思想的简单拼凑和机械组合，而是在理解和接纳多元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打破学科壁垒，实现思想的深度整合与融通，通过探寻学科间共同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推动教科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从理论基础来看，教科书研究起源于诸多不同的学科，是一个跨越文化学、出版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具有多层次、多视角的特征；从研究对象来看，教科书研究的对象是复杂多变的，教科书研究既要分析教科书文本、练习设计、插图编排、助读系统、印刷装订等静态的内容形式，又要分析教科书形成、使用和发行的动态流通过程。由于教科书和教科书研究涉及到不同的学科知识、不同的主题内容、不同的历史时代，文化学、出版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历史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都为教科书研究领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持。为此，教科书研究者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展研究，通过打破学科界限，在理解和精通多个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教科书问题进行不同视角的探讨，使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合力”，从根本上推动教科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教科书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范式，必须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必须不断吸收新兴的哲学、出版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注重博采众长，广泛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教科书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范式，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其他学科知识体系开放，多角度地分析和研究教科书问题，使得教科书研究获得一种宏观的理论视野，深层推进教科书理论与实践的长足发展。

（二）构建“理论－现实－历史”的三维研究框架

教科书研究者应坚持“理论引导”“现实指向”“历史反思”的原则，应在“理论－现实－历史”的三维空间中把握教科书问题。

“理论引导”是指坚持理论在教科书研究中的指导和解释功用，提高教科书研究的理论思维能力。与传统研究不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教科书研究不再停留于经验层面，而是上升到科学理论的思维水平。科学化的教科书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原理为基础，构建一系列高层次的、包容性强的理论框架，形成普适性和整体性的方法论原则，多方面、多视角、多方位地考察教科书问题。这种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是不同学科对话和交流的深层根源，是推动教科书研究发展的“合力”。缺乏理论整合和方法论指导的教科书研究，不是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教科书研究。

“现实指向”是指教科书研究的目的在于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改进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为课程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戴顿指出：“教科书是为学生设计的某一学程的学科内容的书面性指导材料，这是教科书的明显的本质特征。”[①]可见，与科学专著不同，教科书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学生提供某种学科领域的入门知识，提供为达到特定教学目标学生所必须掌握的内容，它必须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同时，教科书以中小学教师作为主要使用者，还应有助于教师准确把握学科知识、循序渐进地开展教学活动。以此为基础，教科书研究不仅应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而且要关注学生学习的适用性和教师教学的有效性；教科书研究不仅要探讨教科书中应如何组织科学知识、渗透科学思想，而且要考虑教科书内容如何适应广大学校教育的现状、满足多数教师和学生的需要；教科书研究不仅要发展科学的教科书理论，而且要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理论应用于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中，提高教科书的编写质量，更好地

① 戴顿：《教科书在教育中的作用》，瞿葆奎编：《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下）》，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5 页。

完成课程改革的任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课程实施的效果是检验教科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为此，教科书研究只有指向现实、着眼于我国丰富的课程与教学实践，才能从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中寻找研究的生长点，推动教科书研究进入到一个创新和变革的时代。

“历史反思”是指对教科书发展、演变的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分析和整理，从整体上明晰教科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主要问题，揭示教科书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通过对教科书的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有助于探寻我国教科书发展的历史规律；通过剖析不同时期各类教科书内容和形式的特征及其演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发展中寻求教科书质量评价标准的演变；通过阐明不同时期教科书的历史背景、学制政策、编制过程和使用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学制与教科书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通过批判性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把握现实、展望未来，从而与时俱进，不断开拓教科书研究的新视域和新领地。

“理论－现实－历史”的三维空间是教科书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活动，教科书研究需要跨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促进专家与教师的合作对话，实现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现实探讨与历史研究的统一。只有将高位的理论研究、现实的实践探讨和百年的历史追溯相结合，才有助于人们把握教科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属性，发挥其传承文化、启迪民智、增益教学的实际功用。

（三）运用多元互补的研究方法

多元互补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将成为主要的教科书研究方法，现代教科书研究方法应遵循“质”“量”并重、“纵”“横”贯通、“动”“静”结合的主要原则。

首先，“质”“量”并重，教科书研究注重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量化研究包括频次分析、篇章分析、难度分析、深度分析和广度分析等，它可以用于确定教科书中某个人物、主题或概念等相关类目出现的频率，教科书中阐述某个人物、主题等相关类目的文字篇幅，教科书内容的难易程度，教科书所需要的思维深度，教科书所涉及学科领域或知识点的广泛程度等。这可以揭示教科书知识选择的价值标准、重点难点及其与课程标准的吻合程度，为教育部门及教师使用、选择和评价教科书提供理论参考。作为对量化研究的补充，质性研究包括解释学分析、话语分析、价值取向研究等，它可以揭示教科书文本中难以测量的内容，比如，教科书中隐藏的基本假设和意识形态，教科书传达的价值和意义，教科书的内在呈现形式等。质性研究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及其对教科书的理解，没有严格的分析步骤则是一种叙述性研究。

实际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在教科书研究中是相辅相成的。Gilbert 指出：“量化分析具有较高的信度，其对分类规则的明确界定、编码员的训练及其相关设计步骤使之成为一种低干扰的分析步骤。然而，选择哪些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则是一个具有较高干扰性的步骤。”[①]选择哪些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实际上是一个质性研究的问题，为此，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在教科书分析中十分必要。作为一种最常用的教科书研究方法，内容分析便是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完美结合的典范。内容分析是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了解教科书文本的特征，以此获取质性的结论，推论教科书所蕴含的意义或分析其背景、原因和变化趋势，是一种“质”与“量”并重的研究方法。

其次，“纵”“横”贯通，教科书研究既要开展横向研究，又要开展纵向研究。教科书研究要注重开展横向的比较研究，要尽量涉及不同地域范围、不同类型的教科书，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教科书及其相关问题的横向比较，揭示不同版本、不同国家教科书在编写理念、内容结构、编排体例和版面设计上的异同，吸取先进的理念方法，为改进本国或本地教科书提供借鉴。同时，教科书研究还要开展纵向的历史研究，探讨教科书中的主题内容、结构体例、功能地位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考察不同时期的教科书中社会历史、地理和政治形象的演变，揭示教科书与社会历史转型的深层关系，探寻教科书在历史发展中

① Rob Gilbert, Text Analysis and Ideology Critique of Curricular Content, In: De Castell, 1989, p. 63.

发挥的社会作用。

最后，“动”“静”结合，教科书研究强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统一。静态分析是将教科书视为一种静态文本内容，从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视角出发，对教科书的难度深度、练习设计、文字插图、助读系统、单元编排、印刷制作等方面进行分析，揭示教科书在文化知识、思想道德、认知发展和出版编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如果说静态分析是将教科书置于课堂教学之外的研究活动，那么动态分析则是将教科书置于课程实施背景中的研究活动。动态分析关注教科书与教育目的、教学活动、教师、学生等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旨在了解教师、学生及教研人员对教科书的看法，社会大众对教科书的认同，教科书的实际使用效果，教科书从编写、审查、出版到市场流通的整个过程。动态分析是对教科书在课程行进中的见证。

总之，在教科书研究中，不同的方法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教科书属性的多元特质、研究领域的复杂性和分析目的的差异性决定了教科书研究应采用多元互补的方法，应依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特点选择其适用的方法。

The Content, Value and Methodology of Textbook Research

WANG Pan-feng, CHEN Yang
(School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of textbook research, so as to it mor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First, textbook research is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extbook,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extbook interpretation and textbook analysis. Secondly, apart from research, textbook research also involves text and teaching analysis. Thirdly, textbook research promot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evaluation, while enhancing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as a whole. And lastly, textbook research should adopt the paradigm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theory-reality-history" and utilizing multiple complementary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 Textbook Research; Scientific Research; Text Analysis; Teaching Analysis;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子聿)